

◎百家谈

把小说还给小说

——读肖克凡

陈世旭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究竟什么是小说，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呼唤，高歌，思考，探究，梦幻，宣泄，试验，变异……一个接一个的文学潮流，其来滔滔。小说像戏剧演员，浓妆艳抹，遍身披挂，扮演着各种角色，演员本人却不知辨认了。我这个念完初中就在农场乡镇盘桓近20年的青涩的文学梦想者，突然被卷进激流，晕头转向。

什么是小说？

为了多少给自己一点信心，千辛万苦去找小说的来历。

翻到《汉书·艺文志》。原来先秦诸子百家就有“小说家”，是稗子般卑微的小官，收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造故事。圣人看作“小道”，君子不为，世人不重。但因为多少能反映民情风俗，还有点看头，得以持续。

显然，中国小说的出身并不怎样高贵，之后很长时间都不是什么大事。小说地位忽然提高，是近代的事。晚清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现代意义的新小说，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激荡、交流和融汇，更拓宽了小说艺术的空间。然而，随着小说形式发展走向极端，新时期文学陷入了寻找和确定自身发展新起点的困惑。于是，传统叙事在现代语境中进入新的轮回成为必然。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将小说还给小说。

肖克凡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天津实力派作家，肖克凡已经写了多部长篇，数十部中篇，百余短篇，其中不止一部被搬上舞台、银幕，多次获各类全国期刊奖、文艺奖。但所有这些肯定似乎都没有充分反映他的艺术成就。评论家张陵指出：“肖克凡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山楂树之恋》……对他来说，其实是一部可有可无的作品。他最有价值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机器》……直到现在，其提供的文学形象还没有被超越，仍然像教科书一样放在那里。”

全面解读肖克凡，是我的能力难以胜任的工程。我唯一能做的是从我接触过的文本，试图窥其一豹。

我看得最清楚的是两个字：传统。

“传统并不意味着活着的死亡，而意味着死去了的还活着。”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这个表述，仿佛是对肖克凡小说的一个特别认可。

在我看来，最深的道理都是最浅近的；最美的物事都是最简洁的；最大的底气都是最平和的。好的小说，首先就是好的人物、好的故事、好的语言。这里的“好”，指艺术。

肖克凡的小说，可谓有此“三好”。

我捧起紫竹提盒跑出家门，身后追来祖母的声音：“别颠！洒啦。”

沿着东兴大街，我跑过什锦斋饭庄，跑过华明理发馆，跑过白傻子布铺，一直跑向著名的“三不管”。

◎新作评介

美的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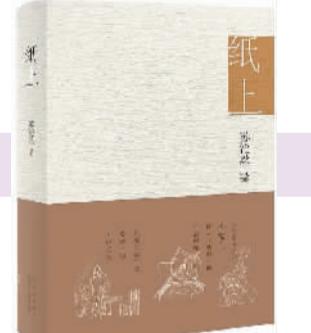
——读苏沧桑散文集《纸上》

行 超

沧海桑田，“苏沧桑”这个名字，似乎天然地赋予了作家一种如影随形的独特气质：柔软的、优美的、抒情的，却自有一种生命的慨叹贯穿其中。《千眼温柔》《银杏叶的歌唱》《一个人的天堂》《风月无边》《所有的安如磐石》，这些散文集的名称，一次次昭示着这位江南女作家对于“美”的追求，也正是在这种追求中，苏沧桑的散文逐渐成为当下美文写作的典型代表。

苏沧桑的散文新著《纸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以中国南方珍稀的“非遗”文化、手艺行当、风物人情为基本元素，写丝绸、茶叶、戏曲，写纸、写蜜、写酒、写船娘……所写之物，自带一种中国古典之美。苏沧桑的文字不疾不徐、典雅蕴藉，正如她所塑造的那个物质世界一样，“充盈着水汽和灵气”，融汇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审美世界。

探究《纸上》之“美”，不难发现，苏沧桑笔下事物的“美”并不仅限于自身，更包含了人的主观因素，是“自然的人化”。通过人的劳动，蚕丝抽织成丝绸，毛竹变成了纸张，蜂箱中酿出了蜜，千亩茶园一片清新



的嫩绿……作者耐心描摹了“美”的产生过程，注目于创造美的过程中那些普通劳动者所倾注的巨大心血与付出。于是我们看到，为了造出失传已久的开化纸，朱中华尝遍人间艰难，捞纸师傅徐洪金在纸浆水中浸泡了45年的手掌，“比白纸更白”；经年累月的采茶，让祝海波的岳母、黄建春的妻子练出了“一双蝴蝶般在茶尖上飞舞的手”，“每一个指甲都被茶汁浸染成了黑色”；靠天吃饭的养蜂人，如吉普赛人般流浪天涯，步步惊心。沈建基曾经被酷暑中暴躁的蜜蜂蛰了100多个包，险些丧命；郭靖曾被蜜蜂蛰进脖子上的一根血管，中毒昏厥……“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向往，对于美好事物的描摹，更是代代作家共同的追求。只是大多数时刻在“美”的面前，我们一味地欣赏、享用，无心探究“美”的来源，更不知在“美”的背后，竟然蕴藏着如此的惊心动魄。

朱光潜先生在谈及“美的本质”时曾说：“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态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性质。”的确，真正的“美”

光。在引人入胜的世俗故事后面，是对生存环境的犀利体察，对生活真相的沉重叩问，对社会历史的冷峻思索。在家长里短中穿越沧桑世事，在市井烟火中透露哲理思考，在日常叙事中呈现历史变迁，肖克凡显示出提炼生活素材和驾驭宏大叙事紧密结合的非凡才能。

肖克凡小说的语言明显打上了只属于他的艺术烙印。天津人特有的语言优势与他个人出色的幽默感相得益彰。

车轱辘，没法比；电气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王八瞪蛋是电工，大锤震耳是铆工，溜溜达达是电工，轻轻松松是化验工。

《机器》中这些来自产业工人的语言火花，让工厂的钢铁棱角顿时变得柔和，也给肖克凡的小说增添了强烈的个性色彩。他的小说语言主要采用天津方言，独特的民间俚语作为叙述的基本话语，极为生动地反映出地域的世风民情，“津文化”深蕴其中。

肖克凡不是有城府的人。他思维敏捷，多才多艺，伶牙俐齿，妙语连珠。争辩起来，言辞锋利，无可招架。也许正因此，他小说的文字反而力求平淡和隽永。不过在风平浪静、清爽利落的文字下面，是强烈的情感冲动以及语言本身的张力。

肖克凡相信，语言是对生活本质的还原。他的小说语言力求过滤掉一切杂芜——种种流行的装饰或是虚张声势的泡沫，最大限度地洗练至透明、近乎冷硬的境地。

肖克凡小说中的传统叙事显然背离了标新立异的时尚，在当下难以引发轰动效应。但他始终保持冷眼旁观的坚持，并不因此沮丧。他相信艺术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仅仅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语言汨汨流动的韵律，就是对心灵的莫大抚慰。他说他的写作基本上处于“无目的”状态：“写作是一种自律，同时又是一种自由。”这样的写作状态，使他的写作优游裕如，举重若轻。

罗丹说：艺术家这个词的最广泛含义，是指那些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愉快的人（《艺术论》）。肖克凡就是这样一个人。

回到《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者流”，圣人即使不以为然，也不能不承认“虽小道必有可观”。千百年来，经历了种种变异的小说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小说是一种揭示：人世间的真、善、美尽在其中，假、恶、丑无可遁形；是一种评判：是非功过，公道自在人心；是一种良知：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的表象下面，永远有一颗为多数人认可的坚固的价值内核。小说是苦海沉浮的罗盘，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计。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者流”就绝不是一个卑微的人群。

对于曾视如生命、又让她遭遇命途坎坷的越剧，她似乎只是变了爱的方式，而“越剧不失传，是她最大的梦想”。《跟着戏班去流浪》中，苏沧桑着力探究的是被越剧之美所遮蔽的人们。正是在这些籍籍无名的演员身上，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磨砺中，我们看到了更为坚韧、更为恒久，也更令人动容的美。

中国文学的美文传统其来有，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梁启超提出，中国的美文传统有两大起源：一是古代歌谣，汉魏乐府等民间创作，二是《诗经》到建安之前的诗。古典文学中的韵文、诗歌尤其集中体现了美文的特点。五四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现代白话美文更以其抒情性、审美性，构成了“文以载道”理念的补充与反叛。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一些美文作家越来越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甚至走入了学者解志熙所说的“唯美化的偏至之途”。这些作品中，“美”是虚浮、单薄、脆弱的，美成了一道枷锁，束缚住了作家的思想和手脚。与之相比，散文集《纸上》不仅写出了丝绸的精美、越剧的动听、茶叶的清香，更写出了美的“反面”：那些艰辛的付出、粗糙的皮肤、患病的身体、坎坷的人生，它们看起来是“不美”的，但正是这些“不美”的瞬间，才让真正的“美”有了根基，变得可触、可感，进而可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散文集《纸上》完成了美的突围。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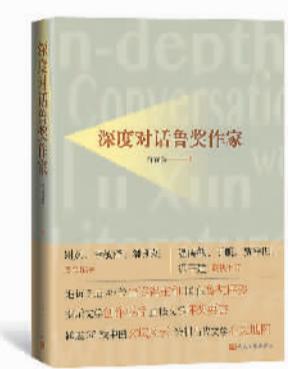
“学医的经历对池莉一生的写作为以及认识人性与生活本相，影响巨大”“许是岁月的磨砺，让当年锋芒毕露的王跃文，在步入中年的过程中，逐渐成熟稳重”“书写农民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落和心灵蜕变，是关仁山的一个想法，也是一个目标”……这些是《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对当代著名作家的评价。与学院派的评论家不同，她的结论是从扎实细密的采访中得来的。在《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一书中，作者舒晋瑜追踪采访了7届49位鲁奖获得者和10位鲁奖评委，其中受访作家包括史铁生、冯骥才、韩少功、刘恒、余秋雨、池莉等，受访评委包括陈建功、丁帆、牛玉秋、李炳锐、吴思敬等。在这部访谈录中，作家和评委面对舒晋瑜的提问敞开心扉，披露出诸多鲜活生动的一手信息：大到几十年创作的心路历程、文学生涯的起落得失，小到获奖前后的心态变化、某部作品的创作机缘等。更为难得的是，《深度对话鲁奖作家》还通过评委的讲述，直抵文学评奖的要害之处，让我们看到文学的另一番风景与天地。

“不同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鲁迅文学奖门类多、获奖作家多、争议的声音多——种种因素，有可能使任何人涉足其中都招来微词。但这些都不曾动摇我的决心。在起意写《深度对话茅奖作家》的同时，我就决定下一部写‘对话鲁奖’。这两项国家级文学大奖，囊括了众多优秀作家，在各类型裁创作上，他们是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其中很多作家有30年以上的创作经验。”舒晋瑜认为，梳理他们的创作脉络，对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应该是有意义的。她希望能够通过平等对话，从创作与评奖两个角度透视中国作家群体与文学界，呈现当代文学的心灵地图，进而让更多读者了解到真实、丰富、立体的作家形象。

评论家潘凯雄认为，舒晋瑜作为一名资深记者，深谙提问之道。她不仅对作家的获奖作品非常熟悉，而且对作家的基本状况和其他代表作也比较了解。她的提问，涉及到受访者的诸多重要作品，也涉及到作家的生活种种。“这种多角度、立体式的问题设置，体现了对‘深度’的追求。”而在作家刘庆邦眼中，舒晋瑜是“作家的知音”。他说：“当作家的大都不爱多说话，并不是他们无话可说，相反，每一个勤学善思的作家都有一肚子两肋巴的话要说，饭端给饥人，话说给知人，他们在等待、在选择，等待能倾听他们说话的人，选择能和他们双向交流的人。舒晋瑜以诚恳、尊重、虚心和学习的态度，赢得了作家的好感和信任。”这部作品，正是作者与作家交心的成果。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聚焦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举行

本报电（胡志、张羽婧）10

月22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举办的“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暨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研讨会”开幕，140多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参加研讨。

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和“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方法提出以来，当代文学研究步入历史化进程。文学研究的中心不仅是对作家作品意义的分析阐释，同文学创作、评论相关的文学制度、期刊文献史料、人物本事等都被纳入当代文学研究视野，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在这一背景下，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与会学者就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现状与理论、历史化与文学批评、当代文学史编写、当代文学史料学建设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结合自己及前人编写文学史的经历，强调文学作品个体阅读经验的重要性，倡导撰写“有血有肉的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则以三个研究考证实例，点明“历史化”应该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解决具体的文学史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光伟从郭小川诗歌的考证等出发，主张从一项项具体研究入手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浙江大学教授吴秀明从“历史化”概念问题、研究主体与文史互证等方面对“历史化”研究路径做了系统阐释。

围绕历史化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之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勇认为，文学史研究应当对接当下生活。南京大学教授吴俊认为，文学史首先由文学批评和批评史建构而成，“历史化”作为学术实践应该从对象史料的充分挖掘、史料分门别类的整理、专门史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历史化与史料研究也为与会学者所关注。武汉大学金宏宇教授提出“限制阐释”的实践路径与操作方法。

中山大学郭冰茹教授阐述了访谈录、口述史进入文学史书写的价值和意义。

多位中国作家作品亮相法兰克福书展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10

月24日，为期5天的第73届法兰克福书展闭幕。受疫情影响，本届书展以线下实体展会为主，线上平台相配合，主题为“重新连接”。在中国出版联合展台上，51家中国出版单位的1007种、1495册精品出版物集中亮相，其中不乏中国作家精品力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作家铁流的报告文学《靠山》、广东教育出版社带来作家叶依的传记文学《你好，钟南山》、北京出版集团带来阿来的《云中记》等作品。中国作家雪漠代表作《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凉州词》《母狼灰儿》《雪漠小说精选》的中文、英、法、德语、阿拉伯语译本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和中国出版集团展台集中亮相，受到了来自各国出版商的关注，其作品目前已有多外文版本。

此次法兰克福书展恰逢美国国家图书奖公布终选名单，人民文学出版社代理的格非《人面桃花》英文版入选了翻译文学奖项提名，将与其他4部作品参与该奖项角逐。该社也借书展机会向海外出版社重点推荐了作家格非的作品，多家出版社已表达出版意向。